



幾乎由新亞人包辦。」

文振球說：「聯合書院的氣氛傾向自由開放，最主要討論議題往往與實際的生活問題有關，由聯合飯堂到四年一宿，都是曾經上過大字報的題目，當時聯合正興建恆生樓，落成之後大家方可享有四年一宿，幾代的聯合人，大家都有關注『上樓』的問題。」

百花齊放的校園

當時，中文大學本身亦經歷急促的轉變，而其中鐵路系統更改變了中大的精神面貌。

蔡子強解釋：「八十年代，九廣鐵路運輸系統開始改善，加上地鐵全線通車，中大人外出到市區的時間大為縮短。至此，中大不再是一個孤立的社群，中大學生到市區次數多，生活開始多元化，對校園的參與亦相應減低。」

八八年入學的陳燕玲亦有同感：「八十年代後期開始，兼職方式出現多元化，相較起來，八十年代初及中期的學生便較關心社會和具使命感。而在九十年代初，地產市道開始蓬勃，經濟掛帥，學生亦較功利和個人化，學生不一定有優化社會和使命感，較難爭取學生加入學生會，因組閣人數不足或投票時選票不足法定人數而流會，更司空見慣。」

八七年入學的利國棟的感受更深：「有時連投票亦出現困難，要在范克廉樓到處拉票。在我們的時代，甚至有學生炒外匯和倫敦金，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掛帥。」

陳敬創說他是對當時學生會活動反感的人，學生會過分政治化，令人有窒息的感覺。「八五年我參加迎新營，感到學生會強調的價值觀，並不是每位新生能夠接受。」大學生對本身的角色和理念各有懷

抱，令校園的氣氛出現變化。

學運低潮，學生的興趣也開始個別發展。

八六年入學的黃志明，二年級從崇基轉到的逸夫書院：「記得陳佳鼐院長說過，逸夫沒有傳統，所以也沒有包袱，因此逸夫亦出現了許多新事物，如氣功學會和投資學會……都是中大前所未有的。」

陳燕玲說，她進入大學的年代已較多元化，迎新的時候，雖然亦有一些時事或政治論壇，但活動內容主要教學生如何適應大學生活。而她當時的校園生活較多元化，如民歌團，英文系系會及不同學會，亦會偶然協助學生會主辦的活動，學生可以涉獵不同活動，對立面較少。

難忘的六四事件

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打破了校園的寧靜。

蔡子強說，八九年以前，中方和中大學生會之間關係非常緊密，成為統戰目標。八五年中方甚至有意在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為中大學生會預留席位。每年學生會「上莊」，新華社官員例必到賀。又不時辦「遊船河」，聯絡彼此感情……今日很難想像，當日的學生會，如何能夠跟中方官員，維持如此密切的關係。

「可是，八九年中國情勢峰迴路轉。胡耀邦下台，學生會只是採取和而不同的態度，直至六四事件，雙方才正式決裂，彼此分道揚鑣。」

「五月十九日深夜，李鵬宣佈戒嚴，正值凌晨時分，學生會馬上在宿舍到處拍門，要到跑馬地新華社抗議。由於沒有交通工具

，學生要求商台宣佈，表示有批中大學生，要到跑馬地聲援北京學生，結果瞬息間，大隊的士四方八面沿大埔道趕來，免費接載百多名大學生。」當晚凌晨狂風暴雨，八號風球高懸，正值考試季節，中大卻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第二天天亮，示威遊行的浪潮，已經席捲整個香港。

「結果是八九年六月四日，崇基學生都沒有參加畢業禮，響應學生會呼籲，身穿學士袍到遮打花園抗議靜坐。」沒有行畢業禮的陳敬創，說出當時的情況。

陳燕玲：「六四令學生的心態改變。令原本只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學生，變得更關心社會。」



▲八九年「六、四事件」是學運的轉捩點，當時有份參與遊行的陳燕玲用相機拍下示威人士放置於新伊館背後面向新華社為悼念六四之“神位”。



▲中大四改三曾經在校內掀起不少爭論，1988年12月學生甚至在百萬大道以罷課來爭取維持學制。